

当代中国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朱佳木 主编



#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与 制度变革研究

武力 著

Dangdai

Zhongguo

Jingji

Fazhan

Yu

Zhidu

Biange

Yanjiu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Dangdai

Zhongguo

Jingji

Fazhan

Yu

Zhidu

Biange

Yanjiu

武力  
著

#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与 制度变革研究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9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研究 / 武力著.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9.5  
(当代中国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ISBN 978-7-5154-0859-0

I. ①当… II. ①武… III. ①中国经济史—现代—文集 IV. ①F12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7914 号

出版人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张 瑞  
责任校对 康 莹  
封面设计 古润千溪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s@sina.com](mailto:ddzgc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场部 (010) 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印张 1 插页 46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 66572159 转出版部。

# 目 录

- 新中国历史发展概述 / 001
-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内外交流”政策 / 043
-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股市和建立长期资金市场的设想 / 054
-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关于直接利用外资的思想和实践 / 062
- 1953年修正税制的前因后果 / 069
- 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092
-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动力市场及国家调控措施 / 103
- 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 / 121
- 略论合作化初期党对农业问题的三点认识 / 133
- 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合作社经济效益剖析 / 148
- 论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由经营方式转变为改造方式的原因 / 164
- 毛泽东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 / 170
- 论20世纪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 / 185
- 中共八大路线未能贯彻到底的经济原因 / 195
- 20世纪50年代国营企业党政关系的演变 / 204
- 1949—2004年中国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 / 217
- 中央政府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 231
- 1949—2005年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因素 / 242
- 中国工业化规律探析 / 249
- 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 / 270
- 工业化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梦 / 288

产业史与科技史融合研究的几点思考 / 293
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绩效分析 ( 1949—2005 ) / 299
关于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的探索 ( 1949—2010 ) / 312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 ( 1949—2012 ) / 325
城市房地产的变革与发展 ( 1949—2010 ) / 337
从 200 年的大视野看新中国 60 年经济发展 / 356
中国实施 11 个五年计划 ( 规划 ) 的历史经验 / 369
从“十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经验 / 376
生产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财政转型 / 389
西藏跨越式发展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402
吴文化与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415
工业化、市场化下的文化发展历程与趋势 / 423
后 记 / 432

# 新中国历史发展概述\*

中国唐代的诗歌中曾经描述时光流逝和世界变化：“时光如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69 周年，69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从一个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发展成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到 6500 多美元的新兴大国，而这些又是在人均资源匮乏、依靠自我积累的条件下实现的，并由此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理论、道路和制度。

## 一、开天辟地：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东方

1949 年以前的中国情况：据麦迪森估计，18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占世界 GDP 总量的 33%，居世界首位；到 1900 年则下降到 11%；到 1950 年则进一步下降到 5%。从人均 GDP 来看，1820 年中国人均 GDP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90%，1900 年则下降至 43%，到 1950 年则进一步下降至 21%，差距不断扩大。<sup>①</sup>另据麦迪森估计，1820—1952 年间，中国 GDP 和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22% 和 -0.08%，而同期欧洲的 GDP 和人均 GDP 则分别为 1.71% 和 1.03%。<sup>②</sup>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这个当时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文明古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中国自 1840 年以来的百年战乱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走上了富强民主的现代化道路，而且也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这一点越到后来越明显。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用很短的时间就

---

\* 本文是 2014 年为大型中英文画册《中国（1949—2014）》写的绪论，在收入本书时，对其进行了修订增补，将时间下限延伸到 2018 年。

① [英]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中文版前言。

② 转引自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解放了海南岛、新疆和西藏，统一了大陆，但是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阻断了解放台湾的计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在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后，迅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参政议政的各级民主政府。

从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到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仅用五年的时间，就确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制度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政体的基本政治制度，彻底扫除了旧中国“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政治黑暗、法治腐败。从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文化繁荣提供了政治前提和保障。

在经济方面，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方针政策，即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并存发展、“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经济运行上，实行政府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展经济的总方针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首先，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孙中山提出而没有实现的“耕者有其田”，这也是广大农民几千年的梦想。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真正为国家和全体人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后来也被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些企业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主要集中于现代工业、交通和金融、外贸方面。对于广泛存在于城乡中的私营工商业，政府则采取了保护、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即保护民族工商业，利用和鼓励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及经营，限制和改造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及经营。

在社会治理方面，人民政府通过乡村“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清除了寄生于封建经济上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通过城市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清除了长期形成的盗匪横行和黑社会组织猖獗；同时清除了诸如吸毒、嫖妓、赌博、纳妾等陋习和丑恶现象。使得社会面貌风气和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外交政策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部分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禁运，因此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即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阵营里，但是仍然同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

## 二、雄关漫道：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当新中国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后，如何加快工业化步伐以尽快改变中国经济落的后面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首要任务，而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事业受到威胁，也增加了工业化的紧迫感。但是，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非常分散的多种经济成分，使得资源和资金非常分散，在资金、技术、人才都非常匮乏的条件下，显然不利于跨越“贫困陷阱”，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sup>①</sup>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一百多年来战乱对农业的破坏，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还低于两百多年前的雍正时期。

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作为当时瓶颈产业的重工业发展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以及它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使得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要来欺侮我们的。”<sup>②</sup>但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集中有限剩余，即通过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调动国内资源来突破贫困性陷阱。1953年，我国正式确定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内向型经济需要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产业的升级和人

<sup>①</sup>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印，1957年，第4页。

<sup>②</sup>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3年12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口转移一般是遵循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发展规律，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选择了当时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就使得中国需要进行超越常规的制度安排才能完成跨越式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可以集中资源和实行高积累的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中国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由于农产品供给不足，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并对城市私营经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建立之初，就存在着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积累与消费、重工业与农业和轻工业、国内与国外等关系，微观经济也出现了管得太死和激励不足等问题。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各项政策进行了初步探索。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制定正确路线的基本指导思想。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大会肯定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利伯维尔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

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中共八大以后，中国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由于调整经济关系和整顿党的作风，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动荡，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方国家也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同时，由于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不少地方实际上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积累了一些矛盾，因此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在农村中出现了少数农民要求退社，工厂、学校则出现了一些“闹事”的现象。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1957年中国共产党着重思考的重大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但是上述有关经济体制和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有益探索和正确认识，却由于1957年出现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而中断了。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

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在“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同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为了贯彻八字方针，中共中央发布试行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与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由于七千人大会后采取了果断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

60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中国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从而也影响到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但是，主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苏联的变化和国际共运，也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1962年9月中共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

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初，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中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中共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极左势力的代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简称“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

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毒瘤。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抓捕了“四人帮”。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中国从1956年底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2年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但是仍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显著成就，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

第一，在经济建设方面，突破了“贫困陷阱”，保证较快的发展速度，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时期经济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不仅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旧中国是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这种教育落后面貌，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1949年到1978年期间，普通小学数量从34.7万所发展到94.9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14624万人，小学儿童入学率从49.2%提高到95.5%；普通中学数量从4045所发展到162345所，在校学生从103.9万人增加到6548.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598所，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85.6万人。这个时期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第三，科技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就突出。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1972年，农业科学家袁隆平育成籼型杂交水稻。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四，国际地位得到明显提升。新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一贯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在这些国家的积极支持和争取下，中国在1971年10月恢

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而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舞台和条件。与此同时，经过中国长期不懈的努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终于被打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同年9月，中日两国也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随着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热潮，中国的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继1964年与法国建交后，又同英国、荷兰、联邦德国等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其中1970年以后建交的国家为62个。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转机，不仅在当时大大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如上所述，成就虽然是主要的，但是教训也是深刻的。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脱离中国的国情，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偏差。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sup>①</sup>这一时期的失误及其深刻教训，对党以后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 三、历史转折：改革开放席卷神州大地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并逐步形成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从1967至1976年（考虑到“文革”在1966年中虽已开始，但经济尚未受到严重冲击，当年不计入内），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8%，其中1967年、1968年出现倒退，分别比上年下降9.9%和4.7%，1974年和1976年比上年分别只增长1.9%和1.4%。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1%，国民收入（净产值）年平均增长4.9%。10年中，国民经济收入总额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和比例失调也使消耗、浪费现象严重，经济效益降低。以1966年和1976年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各项指数相比，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 34.5 元下降到 19.3 元，减少 44.1%。1976 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 381 斤，低于 1952 年的 395 斤。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调整，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住房紧张，老少三代同居一室，甚至四世同堂的现象十分普遍。

与此同时，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快速崛起，称之为“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或地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经济飞速成长，但在这之前他们只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地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使得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上述这种差距，在 1974 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并主抓外事工作时就已经看到了，1974 年他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并途经法国，就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拉大，因此他在 1975 年主持开展了全面整顿工作，其中重要内容就是清除科技和教育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因此，当邓小平 1977 年恢复工作以后，首先就于当年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开通了公平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通道，随后又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做出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的论断。这在当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

随后，在 1978 年上半年，邓小平又支持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在外出视察黑龙江、辽宁、广东、四川时，也鼓励地方干部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得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没有提到已经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满意。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



更为强烈。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社会上产生的怀疑马克思主义，怀疑党的领导，怀疑社会主义、怀疑人民民主专政的错误思潮，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